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四二）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〇六期 ——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411f）

【史料辨析】	北京市委被打倒之后——对照阅读两本书	何 蜀
【不堪回首】	王友琴的名单和我的母亲	茉 莉
【各抒己见】	文革浩劫，谁迫害谁？ ——搜寻真实的历史、争回世间的公理	刘国凯
【往事如烟】	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二）	老 田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史料辨析】

北京市委被打倒之后  
——对照阅读两本书

• 何 蜀 •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4 年 1 月第一版）一书，因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而引起许多读者特别是“文革”历史研究者的关注。

读到此书前边“动荡的北京市委”等几章的时候，笔者不由得联想到了另一本书，但不是历史回忆录而是小说——王蒙的长篇小说《狂欢的季节》（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 5 月第一版。以下所引该书文字均出自此版）。为什么在读一本非虚构的历史回忆录的时候会联想到另一本虚构的小说？因为这两本书都涉及到“文革”初期中共北京市委被打倒这一大事变。

在《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一书中，作为被中共中央派到北京接替被打倒的“旧市委”领导人担任“新市委”要职的吴德，对他到任后的“政绩”说得很少，很含糊，给人的印象，好像是除了派工作组和为派工作组一事做检讨、组织接待红卫

兵之外没作更多其他事，很快就被造反派夺权打倒了。而派工作组也只是为了“稳定局势”。

历史事实果真是这样轻描淡写的吗？

“稳定局势”这四个字，如今的读者可能不会去多想其更深的内涵，当时的“新市委”要稳定的是什么“局势”？用什么方法去“稳定局势”？“稳定局势”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按照毛泽东的一贯方针，“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新市委”到任后的首要任务，当然就是要“破”，即组织发动原北京市委的干部揭发批判“旧市委”，而且必须揭深批透，批倒批臭。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大破大立”的目标，才能确立“新市委”的革命权威，才能保证“文化大革命”的“健康发展”，也才能“让毛主席放心”。他们要稳定的，首先就是保证揭批“旧市委”不受干扰的局势。

当年“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在组织市委干部集中揭批“旧市委”的工作会议上说得好：“市委决定要打破常规，站到运动前面领导运动，口号是：一切为着前线。”这个“前线”，就是揭批“旧市委”的斗争前线。李雪峰一方面要求市委干部积极揭批“旧市委”，说：“（旧市委）他们盗窃领导权，发出指示性文件，要各单位执行，过去没有被揭露，所以一直都是哑巴吃黄连，不能往上追。现在能讲明白了，责任属于他们。”另一方面又要求“人人过关”：“第二条自己有错误各人认各人的账，你检讨得好就会信任你，自己也要敢起来讲，和黑帮有关系的，要起义立功。如果不揭露，就不能划清界限。”他还说：“那伙黑帮，要他检查，他是不干的，宋硕就是这样。……他不但不改，继续活动。有人现在还活动。”（1966年6月3日李雪峰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录。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身为“新市委”第二书记的吴德，能不站在这场斗争的“前线”吗？8月13日，吴德在“北京市革命师生斗争黑帮分子宋硕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宋硕，长期窃取前市委大学部副部长的要职，忠实贯彻执行彭真、陆定一大黑帮头子和前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极端仇视毛泽东思想，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反对党的教育方针，推行资产阶级教育方针；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革命左派进行迫害打击，造成了北大的反革命事件。在高等学校打击左派，保护右派，结党营私，招降纳叛……”12月12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上（因以自杀抗争而跌断了腿的罗瑞卿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被用箩筐抬进会场批斗的）。吴德代表“新市委”讲话中说：“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一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党的败类，国家的败类，人民的败类。他们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篡军、篡政，实行反革命政变，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这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把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一件大好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彭真是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党阀，长期以来窃据党的重要职位，打着红旗反红旗。很久以前，他就坚决执行了王明路线，超过了王明路线，反对坚决执行毛主席路线的林彪同志。近几年来，他更加狂妄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推行了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依仗权势，招降纳叛，同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赵凡等结成死党，把北京市搞成独立王国，作为他们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据点。”“总之，他们的种种罪行，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要不要彻底清算彭、陆、罗、杨这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恶。要不要彻底清算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的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把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搞深、搞透、必须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斗倒、斗垮、斗臭，必须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这些内容，在吴德的口述中看不到。

然而，笔者却在王蒙的小说《狂欢的季节》里读到了有关的历史内容，真切地感受到了那一时期生动的历史氛围，清晰地看到了那一时期某些人物的精神面貌。

王蒙在《狂欢的季节》中，对“新市委”如何组织动员北京市的干部揭发批判“旧市委”，有浓墨重彩的描写，他还从一个虚构人物祝正鸿（北京市文教口某局副局长）的角度，生动地再现了当年在“新市委”的组织动员和政治高压下，市里干部们如何被迫起来揭发“旧市委”的痛苦复杂的心理历程。

小说中写道：“文革一开始先干掉了北京市委，真是横空出世，晴天霹雳，手到天翻，令人目瞪口呆。毛泽东关于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的批示（一开始是批给市委副书记刘仁的）一到，整个市委全乱了套，一下子世界末日就到了。全市委有百分之八十的同志那几天两眼发黑。活像他们读到的不是毛主席指示而是自己的癌症诊断结论。”（146页）“于是人人两眼发黑两眼离疾心跳气短左顾右盼但还要连连点头称是鼓掌喝彩一副热烈拥护衷心快乐天真活泼的样子。在所有的表态会上大家都抢着发言赞成拥戴，而且都表示自己的态度绝对真诚。说是主席指示说出了自己心里的话——谁也不敢落了后。”（147页）

王蒙在小说里刻划了这样的情节：作为北京市局级领导干部的祝正鸿，在局级干部揭批“旧市委”的誓师大会开到第三天，到食堂吃饭时，“他胃堵口臭，不想吃东西。但想到一批旧市委自己就不吃饭了，未免引人注目，倒像他是什么为反党分子殉葬的‘金童玉女’。”他不得不加了菜“以示心情舒畅与毛主席一条心连心”，然而，加菜后他又想到：“旧市委反党，而他是旧市委的干部，是领导上的红人，他有什么资格如此猖狂？他怎么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大吃大喝起来？他的同事们会怎么看？”他就在这样矛盾的心情中“三口两口把压根就不想吃的东西吃了进去”，好不容易才克制住没有呕吐。（147—148页）

“几天后李雪峰同志吴德同志新班子到来，又是连连开会，掌愈鼓愈响，口号愈喊愈亮，热泪愈流愈盈眶。同时体会愈谈愈深，道理愈说愈透，情感愈表愈真。北京市委确是罪不容诛：这个是披着羊皮的豺狼，那个是化成美女的白骨精，这次是反党黑会，那次是影射攻击伟大的领袖。……帽子小的没用，要戴就往大里戴，帽子愈大，人们愈是心悦诚服。于是愈是没有把握心里其实不信市委是那么回事的人调子愈高，他们更摸不着底，他们更觉得整市委会整到自己头上。他们觉得自己也已经与彭真刘仁一起没了顶，他们压根就是积极分子是领导的红人儿，要不他们也混不上局级干部。他们的落水已成定局，但是还要豁命挣扎，要豁命表态，要横下一条心把市委领导硬是往地狱里送，叫做决不心慈手软，哪怕能抓住一根稻草，也决不松手。”（148—149页）

王蒙甚至写了这样一个只有过来人才会深有体会的细节：“几次揭批市委领导的小组会上，他祝正鸿连一次厕所也没上。他不无根据地认定，严肃的与关键的即决定命运的场合，上厕所是危险的。”（156页）

王蒙在小说中，通过虚构人物祝正鸿在要不要写材料揭发另一个虚构人物陆浩生时的复杂心态，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北京市委干部中的一些带普遍性的心理变化。

陆浩生是“旧市委”书记处文教书记，对祝正鸿是有知遇之恩的顶头上司。揭发还是不揭发？这个难题折磨了祝正鸿好几天。他先是认定不能写揭发材料，“对自己的恩人恩将仇报，是中国人最不能原谅的无耻行径。”

然而，“新市委”派来领导他们处以上干部学习的大员张志远，却一再动员他们揭发，而且

在大会上点到了祝正鸿的名。在强大的压力下，他的想法慢慢有了改变：“他的拒不揭发有什么意义吗？陆浩生已经作为反革命黑帮人物被揪了出来……”“是的，写不写揭发材料对于被揭发的人其实毫无意义，但是，对于揭发人，意义却大得不得了。一个站稳立场，一个划清界限，这就是革命与反革命，光明与黑暗，胜利与失败乃至生与死的关键所在。问题是我并没有要揭发你，我不是责任者更不是主动者，是毛主席党中央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是领导要我揭发，是毛主席亲自批示指出了彭真刘仁旧市委的问题，为旧市委定了性，叫做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如果不是毛主席党中央，凭我姓祝的打死我我也不敢说市委半个不字。我有那个水平吗？我有那个胆量吗？我有那个政治觉悟政治敏感性吗？没有的，没有的，完完全全没有的。说来说去，我不过是听毛主席的罢了，不听毛主席的听谁的？……”（183—184页）

他进一步给自己找到借口：“什么良心，什么不合适，什么不太好，全是旧观念，全是不革命，全是对党的背叛！为了革命，儿子有揭发老子的，妻子有揭发丈夫的，为了各自的立场兄弟姐妹更可以反目为仇……”“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已经革命革到了这一步，那就只能继续革下去。”（185—187页）“对，毛主席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挨骂，挨骂算什么？共产党挨骂还挨得少吗？良心，共产党员只承认一种良心，那就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良心。别人，别人认识不认识决定于他的思想立场观点，我既然认识了就要冲上去斗争……”（199页）他终于下定决心开始写检举陆浩生的材料。

但是，写了检举材料还不够，张志远还逼着要祝正鸿到大会小会上去讲，去现身说法，讲他提高认识，与“旧市委”划清界限的体会……

检举陆浩生以后，祝正鸿就成了“革命领导干部”，他得到张志远的赏识，不久升任市革委政工组副组长，今天布置批判刘少奇，明天布置反骄破满、批陈整风……然而，事情并没有完。

林彪事件后，张志远被“隔离审查”了。祝正鸿听到消息后，感到自己垮了，“他预见到，很可能上边让他写揭发张志远的材料。这使他感到要发疯。先是五七年把那么多熟人当右派揭发批判，后来把整个市委当反革命集团揭发批判……他硬起头皮，再硬起心肠，他咬紧牙关硬是怎么指怎么打怎么骂，让怎么看就怎么看，让怎么说就怎么说，他自己已经不算是一个人了。可刚批完陆浩生他就知道自己错了。他无法‘妥善安置’自己的良心。这次呢？这次是不是他也还要如法炮制呢？先是推托，再是应付，然后他犹豫踌躇，半推半就，犹抱琵琶半遮面，像是第一次卖身的妓女，不情愿，害怕，想临阵逃脱，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他最后还是得让人按到床上三下五除二一捅到底哗哗流血。再以后呢？揭发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揭发了两次就会有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次，千人日，万人入，向一个人揭发了就得向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做揭发老领导揭发恩师直到揭发亲爹哪怕不是亲爹但曾经误认为是亲爹的表演，像一只狗似地咬完了这个再咬那个……”（392—393页）

虽然是小说，但我确信王蒙不是在“戏说”，不是在无中生有地编造，而是在作现实主义的描写。读王蒙的这部小说，笔者能感受到当年北京市的广大干部曾经受过怎样的痛苦煎熬，北京又是怎样被“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一步步地推向动乱的深渊。

但是，在吴德的口述中，却看不到这些。似乎“新市委”到任后干的只是好事，似乎他作为“新市委”的主要领导成员只是在不断地“走麦城”而没有“过五关斩六将”，没有在揭批“旧市委”的斗争“前线”扮演过什么角色。

在吴德口述中，有这样一小段涉及到与“旧市委”领导人的正面接触：“新市委成立后，李雪峰让我找刘仁谈一次话，问一问刘仁还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我和马力一起去的，马力当时任市委的秘书长。我和刘仁原来很熟悉，我们曾在晋察冀一起工作过。见面后，我问他还有什

么问题需要说的，他说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彭真犯什么错误我就犯什么错误。谈话不多，我也没有说什么就走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24—25页）

这样的说法未免太轻描淡写了。

王蒙在《狂欢的季节》中，描写了“新市委”派去主持北京市处以上干部学习和揭发批判“旧市委”的大员张志远，他为了动员干部们揭发批判“旧市委”，可以说是竭尽全力，把历次政治运动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都用上了。他在大会上对干部们说：“旧市委领导反对毛主席事实俱在，铁证如山，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为什么在座的一些同志，至今仍在观望等待，放不下包袱开不动机器，就是不揭发不批判划不清界限呢？”（151页）“一些同志至今不肯揭发旧市委，你们以为你们可以蒙混过关吗？你们自己与旧市委的问题牵连很深，你们以为我们不知道的吗？你们当中有哪些牛鬼蛇神乌龟王八你们以为我们不知道吗？你们以为表表态就行了吗？你们以为浮皮潦草地说一说就能够继续革命了吗？你们以为我们是小孩子吗？你们以为隐藏得很深中央就发现不了吗？你们……你们……我们……我们……”一连十几个反问让大家透不过气来。这位代表“新市委”的大员还点着祝正鸿的名说：“……祝正鸿同志，我现在还是叫你同志的喽……你不揭发陆浩生，你自己说说，这说得过去吗？是你不了解情况吗？是陆浩生没有问题吗？要不然，是我们错了？我们不应该动员你揭发陆浩生？你说呢？你说呢？”（152页）

除了大会上咄咄逼人的动员，张志远还找祝正鸿作了几次个别谈话。“与会上的声色俱厉不同，第一次谈话他就变成了春风化雨，循循善诱。”他开导说：“……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老领导啦老革命啦对你不错啦怎么能翻脸检举人家啦什么的。搞土改也是这样的嘛，乡里乡亲的，怎么好出来斗争地主揭发恶霸呢？可我们的人民的江山是怎么样打下来的？都看情面，心慈手软，还有什么革命？革命的胜利，那是人头换来的，你想向党向毛主席争天下，拿人头来！”（158页）“……革命呀，生死的斗争呀，打一次离婚还会死个把人呢，何况一场天翻地覆的大革命！他陆浩生也许当年革过命，可今天，他已经是革命的对象了！你以为革命是光革人家不革自己吗？世界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我们面临的是比以往的民主革命更复杂更深刻得多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敌人就在我们的身边要不就在我们自己的脑子里……再弄不好我们自己就变成了反革命！”（159页）

张志远还变着法子诱导说：“都在一起工作，看清楚也难。不是毛主席指出来，我们还不都是稀里糊涂？烈火才能炼出真金，大浪才能淘尽泥沙，你不投身到伟大的革命洪流中去，你怎么可能提高自己？你怎么可能分清革命与反革命？我们写一个人的揭发材料并不是为了损害他而是为了挽救他。陆浩生已经陷到旧北京市委反党集团里头了，为了对党负责，也是对他负责，你怎么能包庇他呢？真金不怕火炼嘛，真正的革命者怕揭发？没有问题怕什么？真正的革命者连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都不怕，还怕别人揭发自己的缺点吗？他陆浩生如果将来提高了认识，如果他最后还是走上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如果知道是你揭发了他，他应该感谢你，他应该感谢你帮助了他！”（187页）

读了王蒙的小说，会让人感到，张志远这样千方百计动员干部揭发“旧市委”，才真正是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吴德口述中所讲的那种“见面后，我问他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说的，……谈话不多，我也没有说什么就走了。”很难使人相信是当时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成员应有的作法和态度。

为什么读当事人吴德的非虚构作品，会感到不够真实；而读并非当事人的王蒙（“文革”时他在新疆接受“改造”）的虚构作品，却反而会感到更真实、更深刻？

顺便说一下，王蒙的这部小说，其实不是一部能在情节上吸引人的小说，但是对于关注“文革”历史的读者，对于关注那一两代人曾经有过怎样命运的读者，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书中还有相当多的大段大段反思“文革”及“反右派”等政治运动的精彩议论，非常值得一读。

~~~~~

## 【不堪回首】

### 王友琴的名单和我的母亲

• 茉莉 •

翻开友琴寄给我的《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一连串黑框白字的死难者名字迎面扑来。

不久前，在纪念去世的波兰诗人、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沃什时，我提到他的一首诗，——《一个可怜的基督徒对犹太人区的看法》。在这首挽歌式的作品里，米沃什描写一个基督徒在华沙的废墟上，清点大屠杀的死亡人数：

“他碰到埋葬的尸体，数一数，继续推进，/ 他辨别人的骨灰，以其发亮的气氩，/ 辨别每一个人的骨灰，以不同部分的光谱。”

几十年来，中国文革遗留下来的遍地冤坟，至今暗影憧憧。一位不是基督徒却深具宗教精神的女性，二十余年如一日，付出大量心血，忍受着孤独和误解，坚持不懈地清点那些被人遗忘的冤死者人数，贡献给我们这样一份凝重的名单。

就像一曲遥远的挽歌，这份名单让我们追怀死者、思考今天。打开这本厚重的书，仿佛回到少年时代，我的目光忽然盯住了一张张女性的照片——一个个死于文革的女教师、女医生、女干部、……。

——那不是我的母亲吗？那六十年代朴素的穿着，那六十年代简单的发型，以及那六十年代无辜者淳厚的眼神。

我想起了我母亲脖子上的那条疤痕。和友琴名单中的女性命运相似，我的母亲——一位中学教师，在1968年那个血腥的时代，因为刻钢板写错了一个字，把“毛主席万寿无疆”写成“无寿无疆”，自知再也经不起无休无止的残酷批斗，她选择了上吊自杀。

她是怎么被人救下来的？在做出自杀的决定之前，她经历过什么样的折磨和心灵痛苦？这些我至今仍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当时父母在学校遭批斗，把我送到大哥下放的农场躲避，有一天，大哥突然匆匆外出，因为我还小，他什么也不肯对我说。我从农场其他知青的闲谈中得知，母亲因写错字对毛主席不敬，畏罪自杀未遂，正在医院里急救。

以后我见到母亲，发现她的脖子上多了一条疤痕。我没有问，她也从不告诉我那条疤痕的来历。我们只知道她活下来就好，父母兄妹之间忌讳谈这件事，于是，大家假装什么也不曾发生。

侥幸逃出王友琴搜集的名单，我的母亲今天在安享晚年。她儿孙满堂，我们正在准备祝贺她八十大寿生日。而王友琴书中的那些女性——我母亲的同命运者，却没有这份幸运，她们不是

被人活活打死，就是被逼得堕楼、跳水、上吊而死。

她们一那个年代的牺牲者，在照片里微笑着、沉默着，专注地凝视着我们，遥远而又亲近。作为历史的义工，一字一句，王友琴写出她们的悲惨遭遇，唤醒了我少年时代的记忆——我其实无权忘记的母亲文革自杀事件。

一晃三十六年过去，时间无情流失，那么多美好而有价值的生命逝去了，而王友琴的名单，却使逝去的一切重现，并使她们获得永生。

王友琴的名单是一曲挽歌，却又不仅仅是悲恸死者的挽歌，它更是一个民族苏醒的序曲。

对于我们这些存心忘却的人，我们这些冷漠而麻木的人，王友琴的名单具有精神拯救的意义。

~~~~~

### 【各抒己见】

文革浩劫，谁迫害谁？——搜寻真实的历史、争回世间的公理

• 刘国凯 •

中共政权一方面不准民间对中国当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文化大革命作深入研究，一方面又对文化大革命作了一个极其简单的结论——“文革浩劫”。中共政权还把文革分期定为十年，故又有“十年浩劫”之说。文革分期应为十年或三年？笔者另有专文作了辨析。现对此问题暂不予涉及。仅就中共的“文革浩劫”之说进行探讨。

#### 一、算清文革浩劫之账

1、文革基本情况（1966—1968）——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特点是数量甚巨的人们受到冲击伤害。这“人们”分布于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既有达官贵人也有贩夫走卒；既有学者名士也有文盲草民。为不至算糊涂账只得先简单罗列一下文革基本情况。

（1）1966年6、7月间，刘少奇、邓小平主导了全国的第二次反右运动，由各单位党委或工作组掌控运动，把大量的学生、教师、机关职员、工厂工人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小吴晗、小邓拓。其打击的广度和烈度都远远超过1957年的第一次反右。

（2）1966年8月，以共产党高干军干子弟为骨干的血统论红卫兵掀起了“红色恐怖”狂潮。海外学者宋永毅、王友琴所著文革受难者、文革大屠杀对此有详细记述。笔者在此不作赘述。

（3）1966年10—12月，毛泽东指责前阶段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批判走资派，而是整群众。他说这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他号召人民起来批判刘邓的资反线，并决定前阶段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群众应予平反。于是数量极为巨大的学生、教职员、机关职员、工厂工人群起回应，把各单位党领导或工作组推上被批判的地位。

（4）1967年1月毛号召造反派群众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造反派立即回应。各省市各单位大多数的领导都被“夺权”，“靠边站”了。正由于此，群众表现得更加胆大妄为。

除继续批判他们前阶段执行资反线整群众的错误，还批判他们莫须有的走资罪行，和揭露他们一向以来的欺压群众和享乐腐化……

（5）1967年2—3月，各地军方被允许介入地方文革运动。除北京、上海之外几乎所有军方在介入时都认定本地积极夺省市党委权的造反派是反动乃至反革命组织，并予以取缔镇压。同时认定出身成分红、党团员多、对夺权采取较慎重态度的群众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左派组织，并予以支援扶植。

（6）1967年4—5月，毛觉察到军方对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镇压不利于自己的政治清洗决策。于是他责备军方的镇压，指示为被打成反动、反革命的群众组织平反。这引发了这类群众组织对军方的反扑。军方为反制之，遂大力扶植亲军方的保皇派群众组织。

（7）1967年6—8月，在军方的默许、姑息乃至支援、指使下，各地保皇派组织首先使用暴力攻击、杀戮造反派。造反派则抢夺军队的枪支进行反击，形成6—8月间全国性的大武斗。鉴于全国最凶悍的保皇派组织武汉“百万雄师”的垮台，全国的造反派都呈即将取得胜利的前景。

（8）1967年8月，林彪和中央文革错误估算毛要藉武汉“七二〇”事件清洗军内的异己势力，并且也想趁机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遂发动各地造反派掀起“揪军内一小撮”。但毛并没有这个打算，并且毛还深感这样作会动摇他的统治根基，遗患无穷，遂予以严厉指责。阵脚大乱的中央文革把王力、关锋、林杰等抛出作替罪羊。

（9）1967年9月——1968年春。毛的政策作大幅度改变，不再在群众组织中划分造反派、保皇派。强调各地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同时强调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都是好的、比较好的，应予以解放出来工作。前阶段被“打倒”的干部纷纷复职，濒临失败解体的保皇派组织重新麇集并气焰日炽。造反派军心全线动摇。纷纷为今后可能会遭到的“秋后算帐”忧心忡忡。许多人消极甚至退出，但也有人坚持斗争。湖南19岁的高中学生杨曦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出石破天惊的“中国向何处去”。他指出中国已产生了由百分之九十的高干组成的红色资本家阶级。他认为毛本来是要领导人民打倒这个阶级的，但是由于以军队为支柱的保守势力的反对，毛妥协了。第一次文化革命面临失败的危险。

（10）1968年6—7月，各地造反派的头头人物和骨干分子作困兽犹斗。其最典型的表现是广西造反派大规模抢夺枪支弹药与大举镇压屠杀他们的保皇派和军方决死战斗。各地武斗又起。但造反派已是强弩之末。得到各地军方的支援保皇派向造反派发起攻击。许多地方军方甚至直接参与镇压。造反派濒于瓦解。

（11）1968年8月，危在旦夕的造反派在北京成立十几个省造反派组织的联络站，以互相支援，作最后的搏击。毛及其心腹康生等对此极其震怒。毛中央是绝对不容许成立全国性组织的。此时，毛认为自己的政治清洗目的已基本完成。但是，造反派不听招呼，不予合作，甚至有行为脱轨动摇自己政体根本的端倪，故只得下重手实行镇压。造反派迅速瓦解。保皇派则在完成其镇压造反派的历史任务后，十分配合地解散。再由他们组织组成“工人纠察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曾为造反派占优势的学校、机关、工厂等。

（12）1968年秋，在血腥大镇压的基础上，由“革委会”、“工宣队”主持开展长达约一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对前造反派的头头骨干人物进行清算。大中学生在集中进行一段时间的军训后进行分配。学生造反派的头头人物被投入监狱或“牛棚”接受批斗。三届高中生和三届初中生，除少数保皇派红卫兵的头头骨干能留城工作外，其他都上山下乡。大学再



不招生。各级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在67年间大都已成立。少数由于造反派从中作梗而迟迟不能成立的也在荡平造反派后迅速建立起来。党的组织也在迅速恢复。文化革命前的正常政治秩序迅速重建。文化革命的动荡局面基本结束。以上十二点在笔者所撰的《文化革命简析》一文中，是以十万字的篇幅来叙述的。读者若要对文化革命的这些基本过程有更详细的了解，请参阅该文。

2、文革基本情况（1969—1976）——由于中共官方的文革分期是十年，故不妨在此继续罗列“十二点”之后至1976年的中国社会动态。

（13）1969年，基本上全年都是在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运动拿来祭旗的是经典“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经典“阶级敌人”在运动初期的“红色恐怖”运动中就受尽虐杀，许多人已死于非命。1968年6、7月保皇派对造反派大举进攻时，又诬指他们是造反派的后台和同盟军。在镇压造反派的同时，又对苟且偷生的经典“阶级敌人”再进行一次虐杀。此时的“清队”由于残存到1969年的经典“阶级敌人”为数实在有限，不敷使用，当局遂指令把“清理”范围扩大至“国民党残渣余孽”等“公安六条二十一种人”在此就轮到前造反派的头头骨干人物被“清理”了。侥幸熬过1968年夏季大镇压的前造反派头头骨干无论如何也再难侥幸渡过这一关。他们被关进“牛棚”，遭到批斗殴打，被勒令交代反“三红”的罪行。他们的结局依其被挖掘出来的“罪证”而定。有的被定为逃亡地主、漏网历史反革命，遭押回原籍或关进监狱。有的被定为破坏文化革命的黑手、打砸抢分子，在本单位遭受长期的“群众专政”。通过“清队”巩固了重建的共产党统治秩序；也给文革初、中期被造反派冲击过的各级共产党干部提供一个出气的机会。

（14）1970年，全年搞“一打三反”运动。这是个可与中共建政初期的“镇反”媲美的处决狂潮。运动中全国各地都挖出许多反革命组织、反革命集团、反革命纠合集团。“罪犯”一律判处重刑，而且死刑率极高。由于死刑案太多，中央复核工作量太大，忙不过来，遂把杀人权下放给省、直辖市。各地皆以杀人之多显示其革命性的坚决。一些侥幸熬过1968年夏季镇压，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的造反派头头，此时都被从牢房里抓出来，重新判以死刑。杨曦光所著“牛鬼蛇神录”中就述及他的牢友刘凤祥、张九龙、雷特超等就是在“一打三反”中被再判枪决的。就连他自己和张家政、候湘风等都差点被杀。他们如同前批刘凤祥那样被从劳改场拉回长沙监狱，等待下一轮处决高潮就押上刑场。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中央把杀人批准权收回。杨曦光等遂捡回一命。

（15）1971年，“清查五一六”。1967年间，北京有个小组织名叫“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该组织专事攻击周恩来。67年8月以后，这个组织已被压制取缔，再也没有什么活动。事隔三年多后，1971年初中共突然决定在全国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两年前的“清理阶级队伍”那一套重演。许多前造反派成员都被指为五一六分子，遭到关押、逼供、批斗、殴打。很多人被打至伤残甚至死亡；很多人被迫自杀或被逼疯。

（16）1972年。这是最好的一年。非但没有整人的运动，而且工人职员普调工资，五七干校的人员开始返回机关。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一下苍老了许多，而民众则深受其益。当然，是年也搞了“批林整风”运动，但那是在党内、尤其是高层内进行。草民百姓未被波及。

（17）1973至1976年，社会上的整人运动基本终止。中共高层则开展了林彪体系倾覆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官僚集团和以江青、张春桥为代表的新贵集团之间权力争夺的暗斗。在权力争夺中周系占上风，江张落败。邓小平复出除任副总理外，还任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中央政治局常委。江张不甘心落败，遂加紧进行宫廷幕后运作，向毛进邓的谗言。毛遂渐对邓起疑心。指邓，“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1975年秋，以“评

水浒”为标志拉开江张反击的序幕。至年底，矛头指向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正式登场。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邓小平顿失支撑。毛决意去邓。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这个曾经以邪教式的蛊惑令人民群众心悦诚服（应读作心智迷乱）地对他顶礼膜拜的现代共产党帝王，总算在其油干芯尽之时看到人民以曲折方式表达了对他的厌恶与反叛。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奋起的人群中，思想构成是复杂的。有较单纯怀念周的；有借尊周贬江的；有借念周抑毛的。贬江抑毛者有的是站在共产党老官僚集团的立场上；有的是站在人民民主的立场上。然而不管怎样，他们共同构成了一股历史的洪流。预示着中国共产党政权这个专政交响乐中的一个章节——毛泽东时代即将完结。1976年10月，江张集团中的叛变分子汪东兴与华国锋和老官僚集团勾结，以阴谋手段除掉江张集团。

## 二、文革浩劫：谁迫害谁？

在把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的社会状况作了以上十七点的分述后，以事实为根据可以来探究中共的“文革浩劫”论的质地了。从字面上来考查，浩劫是巨大的劫难之意。一个社会发生巨大的劫难必有劫难的制造者、施予者和劫难的承受者、受难者。1966—1976十年间中国社会有哪些巨大劫难？谁是制造者、施予者？谁是承受者、蒙难者？

### 1、谁受迫害的次数多？

1966年6—7月的第二次反右运动中，刘少奇邓小平及执行其指令的中共各级党领导和工作者是劫难的制造者。被迫害的学生、教师、机关职员、工厂工人是劫难的承受者。1966年8—9月的“红色恐怖”运动中，共产党的高军干子弟所组成的血统高贵红卫兵是劫难的制造者。无辜被虐杀的出身“不好”的人和文艺界人士是劫难的承受者。然而深究下去则还可知，这个劫难的根本制造者是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实行阶级歧视压迫的共产党专制制度；是共产党在文革前十七年里对他们的子女所灌输的政治优越感。1966年10—12月批资反线，这是共产党建政十七年来破天荒地第一次把威严无比的各级共产党领导干部推上受质问、责难、批判的地位。暂态乾坤倒转天地变色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这对于他们来说不啻是遭受一场巨大的劫难。这个劫难的施予者是人民群众。而深究下去，其制造者是毛泽东。没有毛泽东的决定、号召，那些草民百姓何以敢如此无礼嚣张地对待昔日神圣不可侵犯的共产党领导干部？然而出于政治上的难言微妙之处，使这些蒙难的共产党干部不敢公开表达他们对毛泽东的不满，而把仇恨的帐本都记在群众身上。1967年一月夺权中，劫难的施予者制造者、承受者与批资反线时的角色相同。只是由于程度的加深，此时蒙难的共产党干部内心对毛已由不满上升为怨恨了。1967年2—3月的镇压行动中，各地军方是劫难的制造者施予者。被镇压取缔的群众组织是劫难的承受者。深究下去，应洞悉最根本的制造者是共产党专制制度。武汉军方在镇压造反派时，武汉独立师一个副师长耀武扬威地说：“把你们（按指造反派）的头杀了来肥田，这就叫无产阶级专政，知道不？”1967年4—5月为2—3月间被打成反动、反革命组织的群众平反，这于军方来说固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由于毛对军方持宽大谨慎的态度，除特别桀傲不驯又纠合有军内派系之争的武汉陈再道翻船外，其他都无大碍。故对军方亦不算劫难。1967年6—8月遍及全国各地的大武斗毫无疑问是一场大劫难。考查各地武斗过程可知保皇派是首先使用暴力者。而且他们由于有军方的纵容支援，故在武斗的起初阶段战果辉煌。但情况很快发生变化。造反派奋起抢枪自卫，武装起来反击保皇派的屠杀。67年夏季大武斗开始时各地保皇派屠杀造反派时都是打著“镇压反革命”、“不许右派翻天”的旗号。例如闻名全国的巨型保皇派组织武汉“百万雄师”在攻击造反派时的动员令就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不过造反派并不真的是像保皇派所说的那样都由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组成。实际上这些“黑鬼”在社会是只占极少数。如果造反派都只由他们组成，那如何能掀起如此之大的声势？造反派中也有出身“好”的，又以出身不黑不红的占多数，少量出身“不好”的人参与其中。这种情况就从质地上决定了1967夏季的造反派不会像1966年夏季

的“黑五类”那样任人宰割。在大武斗中保皇派造反派都死伤累累。说来双方都是这场劫难的承受者。造反派死伤的固然是普通民众，保皇派死伤的大多也不会是有身份的人物。但是这又不能用以否认保皇派的双重角色，即他们既是这场劫难的承受者，又是这场劫难的制造者。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要追究到共产党制度的身上。

1968年夏季大镇压对于造反派是浩劫。浩劫是由毛泽东、中央文革、各地军方、各地保皇派联手制造的。决策人是毛。各地军方和保皇派对毛的决策欢呼雀跃，立即闻风而动全力出击一举踏平造反派。到底有多少“黑五类”和造反派死于这场大镇压，中共当然不会去统计。民间也无法统计。文革中全国只有一个省委第一书记没有倒，那就是广西王，第一书记韦国清。广西造反派“四二二”要打倒他，遂激起他对“四二二”刻骨仇恨。在得到毛首肯镇压造反派的尚方宝剑以后，他疯狂对“四二二”举起屠刀。由十几个县的武装民兵（均属保皇派组织“联指”）配合广西省军区部队，对造反派大举围攻。不但在武斗场上残杀伤员，而且大规模屠杀在武斗场上抓获的俘虏。“黑五类”和造反派分子被杀后，有的被保皇派挖心割肉吃掉。有的扔进西江。这些可怜的浮尸顺流冲下，有的搁浅于各地浅滩；有的直达香港码头。

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是无辜民众和前造反派分子所连续遭受的三场浩劫。死、伤、疯者甚众。与前面几场浩劫不同的是，这几场与保皇派不相干。因为在造反派被踏平后，保皇派亦解散其组织，回到单位内去做回他的“先进分子”，许多还受到奖励提拔，和转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人纠察队”、专案组成员。他们在新生红色政权和重建的党组织的领导下去做“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的打手。

1972年至1976年这几年里。虽然有种种社会波动，上层则有权力争夺，但总的来说，对任何一个社会阶层都不存在“浩劫”。好了，至此可以进行统计了。纵上所述，从1966年到1976年间共有十场劫难。其中有两场（“批资反线”、“一月夺权”及其后的“靠边站受批判”）的承受者是中共官员。有八场（66年6—7月的第二次反右、66年8月红色恐怖运动、67年早春镇反、67年夏季大武斗、68年夏季大镇压、69年清队、70年一打三反、71年清查五一六。）的承受者是民众。

## 2、谁受迫害的程度深？

然而，仅以二比八来判定官与民各自所受的劫难并不精确，因为还须考虑各场劫难的“含金量”。中共官员所受的劫难无非是受批判，被“夺权”，“靠边站”失去了昔日的权势和威严而已。而民众所受的劫难则是被关押、监禁、殴打、杀死，或被迫自杀。至今中共官方始终没有提供文革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的较精确统计。常见的说法是数百万。这里面有多少个是中共官员？文革时期，我已注意对此作广泛观察，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当权派被群众批斗死。而且恰恰相反，许多工厂企业里由于当权派有保皇派的保护，他们受批判只是走过场而已。毫无疑问，反驳我的人会说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不是被迫害死了吗？还有罗瑞卿跳楼自杀。其不死只是侥幸而已。对此必须澄清的是，刘少奇一类的死亡事件并不是民众制造，而是共产党残酷的内部倾轧所至。包括“彭、罗、陆、杨”等中央和省级的一些“大走资派”在批斗会上所受的严重体罚，都应归入此类。施行这些体罚的北京红卫兵组织已纳入中共党内斗争的轨道，而与社会上以反政治迫害为基调的造反运动大相径庭。文革时期发生非刘少奇式的中共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只会是在这样两种情况下。一是这个中共官员被查出有确凿无误的政历“污点”。对这样的当权派保皇派不但不会去保他，而且会下死力去打他，以显示自己革命性的坚决。二是某些当权派由于错误估计形势而选择了支援造反派。结果在保皇派最终彻底得势后，被保皇派迫害虐杀致死。有必要强调说明的是，这样两类当权派被迫害至死的情况数量极少，而且施暴者大多为保皇派。

再谈谈当权派所受“劫难”的性质。中共官员在1966年6—7月间执行“资反线”，把大量无辜民众打成右派、反革命。1966年11—12月间群众批判了他们有什么不可以？这算什么劫难？不能因为批“资反线”是毛泽东要搞的就予以全盘否定。群众趁回应毛的号召之机而起是当年民众反政治迫害斗争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丝毫不遮盖它的正义性。

1967年初的夺权运动使中共官员失去昔日的绝对权威。民众更敢于批判他们。批判的内容从执行“资反线”扩展到他们平日欺压群众、享乐腐化的恶劣工作、生活作风。

这难道不应该吗？当然在此过程中或许有夸大其词，甚至捕风捉影的。这固然不足称道。但是，这与民众在那八场劫难中的家破人亡相比又算得什么呢？至于群众批判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的确滑稽，令当权派们深感委屈。事实上他们哪有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不是一直都在按毛主席的指使办事吗？尤其在文革前的几年，整个社会左得不能再左，把毛捧到神一般的地位。这里面全是中共各级官员的心血和功劳。说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也真是冤枉。群众批判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是为了取得这个批判的合法性而已。当年我已清晰地觉察到，群众在批判当权派执行资反线整群众，和批判当权派平日欺压群众时是多么的群情激愤，而在批判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时是多么敷衍走过场。我甚至听到过批判会开后有人小声议论，“哈，有那么好的事，奖金挂帅、物质刺激？这样的资本主义道路我还真想走走。”“嘘！小声点，你这家伙别胡说。让人听见把你也拉上台去陪斗。”我在旁边听了冲着那两个中年工人笑笑。他们也向我做个鬼脸。账，算了这大半天，应该是算清楚了。与广大民众在文革中所受的巨大劫难相比，中共官员所受的那点简直只是牯牛一毛，而且有些是自食其果甚至是罪有应得，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劫难。然而，一个更大的问题油然而生了。既然如此，怎么中共官方反而要把文革浩劫叫得震天响呢？

问得好！

### 三、中共炮制文革浩劫论的心态目的和手法

#### 1、中共的生命价值观

中共炮制文革浩劫论首先来源于他们那极其扭曲恶劣的生命价值观。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民众的生命和尊严是一钱不值的，而他们则神圣不可侵犯。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几百万人算什么？1960年人为大饥荒中就死了一千多万人（国外有研究者推算是三千万）。另一方面，群众冲击他们则被视为大逆不道。对自身所受损失则感受为暴殄天物。虽同为中国人，但生命的价值在他们心目中竟是有天渊之别。他们受到那么一些波折便感觉为天大的劫难。

中共官僚阶级的浩劫记忆中除了他们自己曾受“批斗”外，还有他们子女的遭难。1966年底批资反线后，由中共高干军干子弟组成的血统论红卫兵失宠。他们不忿被抛弃，更不忿自己的父辈成了“走资派”挨批斗。他们除了把满腔怒火发泄到平民红卫兵身上外，还把矛头指向江青、中央文革和谢富治的公安部。无奈，公安部只好抓了他们。这下不得了了，成了他们遭受“四人帮”迫害的铁证。他们在“红色恐怖”运动中虐杀了那么多的“黑五类”不是问题，公安部让他们坐了几大班房就是大问题。这就是中共官僚阶级的认知标准。

至今三十几年过去，从来没有哪个当年“红色恐怖”运动的参与者出来稍作忏悔。而他们坐的那几天班房则成为他们被“四人帮”迫害，遭受劫难应予得到补偿的依据。

事实也的确如此。当今中国权力圈和高级商界不都被他们所把持吗？文革劫难中，民众所

受伤害是中共官僚阶级的万倍以上。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的几百万人中，中共官员再加上文化艺术界名人的罹难者不足总数的万分之一。中共如此大声疾呼文革浩劫，难道就不怕引起人民对自己在文革中所受伤害的记忆而要求当局补偿吗？

## 2、权力迫使人民健忘

中共当局一点也不担心。中国人是健忘的民族，中共算是吃准了这一点。固然，中国人健忘已渗透在其民族性格之中，但更为重要的是权力当局在强迫和诱使人民健忘。当今，中共当局垄断著资讯、出版业。它对文革实行选择记忆。文革浩劫被它圈述为共产党高干和文化名人所遭的厄运，还有历史文物被毁损。民众遭受的巨大劫难根本不出现在它的笔下。久而久之，文革浩劫就可定型成它所需要的形状。

文革时中国有八亿人口。至今三十八年过去（以文革起始的1966年计），其中约四亿业已故去，一亿多已在晚年。对文革有真切了解者当时起码是读初中三年级。而这一拨人现今的标准年龄已达54岁。换言之，当今五十多至六十出头、对文革有直接了解，且还不算老，尚未退出社会生活者已不足一亿人。约只占当今全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在这个年龄层的社会群体中，百分之八十是文盲、半文盲的农民。他们没有以文字记述史实的能力。剩下的百分之二十的城镇居民中又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正处于领取微薄的退休金，或更微薄的下岗费，乃至生活全然无著之中。这些人已被沉重的现实生活压弯了腰。回忆记述文革对于他们无异是探索另一个星球的事情。在谋生之余尚有时间精力、亦有知识能力去回忆记述文革的，一般来说只会是六一至六六级的大学毕业生，和老三届中“搭尾班车”通过文革后恢复高考读上大学的人们。这一社会群体约只占当今中国人口的万分之一。他们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是中共当局的重点收买物件。除了像蒯大富之类很少数的造反派红卫兵著名头头人物被当局看牢外，其他若无特殊情况（如身体太差、行为出大差错等）都在共产党体制内做了官，或评上教职受到优待，亦有投入商界，颇有斩获者。这些人是绝对不愿意忤当局之意去唱文革反调的。更何况，这些年来风调雨顺的处境更使他们早已把文革记忆封存，乃至抛到九霄云外。至于有些投身过造反行列的更不愿意触动往事，暴露了自己不为当局所喜的经历，那会不利于自己的际遇，毁掉了自己的仕途，将是多么不智。年纪比他们小的一代人在不惑、知命之间。这拨人及更年轻的一代对文革并无直接了解。这些年来没有任何翔实的文革记录提供给他们。他们听到的只是当局一面说词。先入为主的“十年浩劫”、“造反派打砸抢”、“造反派是四人帮爪牙，凶狠迫害知识份子”之类的说词充斥他们耳际、塞满他们的头脑。即使出于对中共专制制度不抱好感，对中共说词持有怀疑的人们，也无从对当局的伪文革说提出质疑。

## 3、篡改历史的手法

说来中共炮制文革浩劫论的主要目的还并不是为自己及其子女诉苦。他们心里明白，那点苦其实算不了什么，何况这些年已得到千万倍的补偿。其炮制文革浩劫论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巩固共产党的专制制度。为此，共产党以三道工序来完成的。一、定论文革全是浩劫。二、指控造反派是文革浩劫的制造者，从而使所有的人都憎恨、鄙弃造反派。三、既然如此，那么文革造反派所做的一切都应予以彻底否定，当然也包括他们冲击共产党统治秩序的行为。通过这样三道工序，务使文革造反派犯上作乱的行为不被肯定，不被继承下来。

在这三道工序中最关键的是第二步。一个笼统的文革浩劫论不难在抽象的意识层面上过关。确凿的文革浩劫制造者被人们憎恨亦顺理成章。关键则是指控某一个社会群体是文革浩劫的制造者须具有说服力。为此，共产党采取了两个有内在的联系程式。

### （1）否认术

否认文革群众组织中有造反派保皇派之分。说所有群众组织都是造反派。理由是他们都宣称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都造刘少奇、封资修的反，都造本省走资派的反。共产党这是在装蒜诈懵。共产党何尝不了解文革保皇派组织以“红”成分的人为骨干和主导，各单位的保卫、组织、政工干部和中层干部大都参与其中。这与以平民身份为主的造反派组织有着质地的不同。共产党还何尝不明白，保皇派的政治行为是维护文革前原有的共产党统治秩序，而造反派则是在冲击这个秩序。共产党的装傻诈懵是为下一步的移花接木、栽赃诬陷作先期铺垫。

## （2）移花接木术

在否认术的基础上把保皇派所干的种种恶行都栽赃到造反派的头上。造反派在文革中真正令共产党深恶痛绝的“恶行”是批判斗争共产党领导干部。共产党深深洞悉这一恶行的巨大危害性绝不仅仅是令这些领导干部个人的威望、精神乃至身体受到损伤，而是使共产党制度的绝对权威受到严重打击。文革前，每个地区、每个单位的领导都是党的化身，神圣不可侵犯。任何反对本单位领导的言行，那怕这个领导只是个20级的乡股级干部，都可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经过文革造反运动后，这一情况有了彻底的改变。共产党领导干部身上神圣的光环暗淡了。人民群众对他们不再毕恭毕敬、俯首帖耳了。共产党统治秩序的威严的确是以各个具体共产党领导干部个人的威严作基础。换言之，共产党制度的绝对权威是各个领导干部绝对权威的有机叠加。基础松动了、流失了，其整体结构也就有崩坍之虞。文革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刁民辈出难道不正是源于文革造反运动吗？说来，共产党干部是多么怀念文革前他们说一不二，人民群众匍匐跪仰的岁月啊。可是，这一切都给那班造反的家伙搅黄了。这怎能不令其疾首痛心切齿痛恨呢？共产党干部当然也明白文革造反派之所以敢于如此大胆妄为，是因为得到毛泽东的暂时许可。但是，对毛是不能正面否定的啊！顶多只能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轻描淡写地讲几句。因为无论如何，毛还是共产党制度的根本象征。一旦彻底否定毛，就会危及共产党体制的根本。故共产党内的大小小平们都强忍下对毛的怨气，而把所有的仇恨都倾泄在文革造反派的身上。尽管当年那班造反的家伙都早已为他们的胆大妄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这仍远远不够。关键的不是把他们抓进牢房，或把他们枪决掉，而是要把他们犯上作乱的行为彻底“批倒批臭”，务使今后再无仿效者。可是，如果共产党对大家说，造反派之所以可恶是由于他们当年批斗过共产党干部，那非但不能达到目的，还会引起某些心怀叵测者的兴趣。因为共产党知晓，当今的中共官僚在民间的印象是多么糟糕。策略的作法是著重把文革期间中共官员之外的人们所遭受的迫害虐杀都说成是造反派干的，从而激起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憎恨它。为确保此大计的实现，必须另辟蹊径。共产党挖空心思终于找到了，那就是否定术加栽赃术。可是还是有个问题。尽管共产党搞了这很巧妙的两术，但具体指控文革造反派迫害虐杀民众的“事实”总不便全由共产党越俎代庖去讲，得由蒙难者自己来说才最有力。

## 4、某些文化人的协助配合

无庸讳言，事实表明共产党这一毒计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系仰仗某些心智蒙尘的文化人的协助配合。许多知识界、文艺界人士是文化革命的第一批牺牲品。在1966年6—7月的第二次反右运动中，和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运动中他们就已深受其害。到了1968年夏季的大镇压和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他们之中有些人又被拉出来陪斗一番。其实他们在过往的两年中都没有参与本地地区的文革运动，没有任何“罪行”可言。批斗他们完全是主政者为营造用以镇压造反派的恐怖气氛的需要。我清晰地记得，在广州的1968年夏季大镇压中，广州最负盛名的画家关山月又被拉在广州河南小港新村路口游斗。看看他那一把年纪，又在八月的毒阳之下长时间地弯腰低头，我真为他难过担心。到了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许多知识、文艺界人士又因其“解放前”的某些经历受到审查。老舍是连66年的“红色恐怖”关都未熬过。但是，基于人强烈的求是欲望，大量的知识界文艺界蒙难者还

是熬过来了。对于他们来说，熬过寒冬就是明媚的春天。

“四人帮”和“凡是派”相继倒台、失势后。共产党老官僚集团主政。他们给曾遭苦难的知识、文艺界人士以优厚的补偿。知识、文艺界人士是有能力、有渠道说话的。他们当然要述说、控诉自己当年的无辜受罪的遭遇。既然如此，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摆出来了。把谁摆到劫难制造者的地位上去？

1966年第二次反右是谁搞的？就是当今给他们平反、补偿的共产党老干部们搞的。“红色恐怖”是谁搞的？是这些老干部们的子女搞的。1968年大镇压是谁搞的？军方和保皇派搞的。当年的军代表们是早已烟消云散了，但如今（指八十年代）单位里掌权的许多就是当年保皇派人物。

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是谁搞的？也是由保皇派骨干分子重组的“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和“专案组”搞的。要著文述说文革浩劫的知识文艺界人士面临裁量，把制造浩劫的罪责算在谁身上？照直说吗？显然不妥、不智。今日的补发工资、升级晋职称，分好房子，还有那上台台下的风光乃至出国考察、进修的机会不都是他们给的吗？不过，既要讲那档子事，总得有个垃圾桶扔垃圾啊。哦，有了，主政者们不是在一股劲地诅咒造反派吗？那就把所有的账都算在造反派的头上，把所有的垃圾都扔进造反派这个垃圾桶里吧。于是乎，人们看到连篇累牍的回忆文章在讲述造反派怎样作威作福迫害知识份子。甚至在造反派还没有产生的1966年夏，和造反派已经被踏平之后的1968年夏、1969年“清队”，乃至更迟的“五七”干校中，都有造反派在为非作歹，在横行霸道。中国现代版的“天方夜谭”就这样写成了。

中国当代最大的“冤假错案”就这样制造出来了。共产党在一旁看了发出会心的微笑。这些文化人还真明事理够意思。花些钱银优待他们也确值得。还是主席讲得对啊。他们那些毛就得附在我们这张皮上。而这毛若强劲的话还真能起到保护皮的作用的哩！

~~~~~

## 【往事如烟】

### 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二）

• 老 田 •

（续上期）

后来才听说，我的那张大字报传播得很广，成都的一些学校造反派、硬骨头造反团等也转抄过去了。学生们对我说，你写的大字报首先是题目很好，引导工人冲破黑暗，预言了运动的展开，帮助人们冲破思想禁锢，以满怀悲壮的语言去迎接运动高潮的到来。接着就有很多人，给我送毛主席语录，不少人争着要我签名，许多工厂的工人也邀请我去厂里串联、支持、讲话等，我就到处讲要勇敢跟着毛主席参加造反，对修正主义和走资派不要怕，工人们觉得我讲的好，与他们的感受和心灵相通。当时我也自认是与八一五的心灵相通的。

我看到一些学生搞抄家破四旧，完全没有章法，例如砸佛教罗汉寺、损坏老君洞、到渣滓洞去砸什么陵墓，我十分反感。更不要跟着搞什么戴高帽游街，走资派就是希望造反派破坏政策，失去运动大方向。我感到当今中国的问题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不能顺利贯彻，中间受到走资派的歪曲，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是对准走资派，要反修防修，避免党变修国变色。文革的对象不是群众中间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不是打死老虎，而且过去的剥削阶级在新中国已

经成了劳动者，我们也不能让他们的子女再接班当剥削者，所以我坚决反对谭力夫提出的“血统论”。有些北京来的红卫兵却认为谭力夫是干部，有水平，讲话是对的；孟宪成说谭力夫是干部子弟，他的观点是错误的，江青批评过，但谭力夫是干部子弟，文化水平是有的，也很能讲话，我们应该是有成份论，但不能唯成份论，老黄，你要注意这个政策。

### 三、酝酿成立工人造反组织

这个时候旧市委已经被学生、工人、起来造反的教师、干部冲得人仰马翻，政府某些部门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工人也起来了，但是还没有人去组织，也有乱贴大字报。革命高潮确实到来了，走资派被冲击，这个时候更需要有工人的组织，把运动引导到搞大批判、大揭发的大方向上来，真正实现灵魂深处的大革命，当时我们根本没有夺权这个概念，根本不敢想到这个方面去。

在南下学生的帮助和主持下，造反的工人在六中高二楼教室开了三次会。第一次是孟宪成提议成立重庆工人造反军，来支持重庆大学八一五学生的运动，也支持各地来串联的造反派学生，到工厂宣传。第一次推举我先承头，还有印制二厂的工人王文华，长安厂的干部郎伯灵，男男女女总共七个人，当时都不敢当头，头天选了第二天就不知去向了；只好第二天晚上又重新选举，这一次有重庆锅炉厂的老陈，402工区建筑工人朱正坤，杨国成等，也是七个人，后来又有几个自行消失了。

工人造反军成立勤务组，选举我当组长，在六中借了两间教室办公。对外发传单，也收集情况，与各厂建立联系，各个单位自己成立组织进行选举，选后到六中来与我们总部挂钩，由于大串联在全国开展，《红旗》杂志的文章和北京的传单不断有好消息，各界的人士都来支持。当时的情景，就象红军占领冬宫一样，人潮涌动，招呼都来不及，什么事情一个招呼都有人积极地去办。在孟宪成、吴有义的帮助下，在北大、清华串联学生的帮助下，我们正式定名为“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并写了《造反宣言》，这大概是八九月之间的事情。

造反军成立不久，由画家正威居间联络，文联的罗广斌约我去谈谈，我当时以为他是作协主席，我当时看到是他在文联主持工作。我从六中走过去，许多工人说你现在需要人保护，自发地跟着我走。从上清寺走到文联，路上就看到一队队保守组织“工纠”在街上游行，他们穿着整齐的新工作服，头戴钢盔，脚穿长统胶靴，列队整齐、口号统一，产业大军上街了！喊的口号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打到任白戈；勒令市委交出黄廉。针对我的传单也很多，有的说我是右派，是反革命份子，曾经受过军法处置，还有的说我是任白戈的警卫员，受命打入造反派的；我看到自己也感到好笑。有一位穿着军装的新华社记者，问我：你看到关于你的大字报没有？我说他们花这么多钱印传单，诋毁我这样一个普通人，真是浪费，要是把钱节约下来给我多好哇。

罗广斌见到我之后，问我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勇气，站出来领导造反军，你到底是怎样想的。我说很多革命前辈都为建立新中国而牺牲了，我要跟着毛主席走革命道路，江姐的革命牺牲精神还是鼓舞教育着我们。我问他是怎么想的，他说我们文联是搞意识形态工作的，我们觉悟不及工人农民，我的主观愿望是永远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走，支持革命派反对走资派，当一个人民的好作家。我说还是要大胆地为工农写出好的作品，要当跟工人一条心的作家，杨益言插话说绝对是应该跟工人一条心。罗广斌最后对我说，要注意政策，问我懂不懂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我回答说就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有些官僚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为我们工农大众掌权，而是披着共产党外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纯洁党的路线，要从共产党内清除他们打到他们。他说你这么说也对，要我多注意学习毛主席著作。



1966年8月份，“十六条”已经发布了，市里走资派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镇压造反，假手保守派对造反派的压制还很厉害，为了防止工人参加运动，凡支持八一五的人就被打成“危险分子”，各个单位造反的人被打成“牛鬼蛇神”。要不要搞文化大革命？支持八一五学生造反对不对？全市的争论都很激烈，在市中心区解放碑，很多的工人农民都自发出来参加辩论，六七十岁的老太太都参加。人民群众是一片沸腾，起来揭发自己单位领导的人很是不少，在公路上、在广场上有人写出了大字标语“八一五好得很”，一个字有几米见方，还有标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李井泉等等，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

在旧市委走资派的指使下，在江北上横街的一个小学里，举办了“八一五”罪行展览，说造反派学生都是流氓无赖，我们有工人去该校调查过，发现都是保守组织造谣，根本没有用门板给女教师正驼背那么回事。他们就是用造谣手段镇压起来参加文革的学生、工人和教师。在一些工厂里，就更厉害了，有的造反派被开除、有的人遭到关押、批斗，动不动就说你破坏生产，扣工资，他们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扑灭运动的烈火，有的单位造反派被逼得跳楼，有的人被当权派逼疯，被游街批斗的更是寻常事。造反派的每一次斗争，几乎都要与当权派组织的保守派发生冲突。我们单位是把我关押在公司里批判斗争，甚至是深夜搞车轮战批判，不敢把我弄出去游街，因为我有一定的影响，他们怕游街的时候被学生抢走。那个时候很多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工人，都不敢回单位，大家都云集在重庆大学或者六中，这就是毛主席在他的一张大字报里所说的“白色恐怖”现象。

我们当时明显感觉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落实到基层确实是困难重重，真切感觉到共产党里头有两股绝然不同的势力：一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这些同志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代表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利益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他们是披着共产党的外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总是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篡改党的政策，任何一次运动他们都是颠倒黑白、矛头向下，打击工人农民和一般群众，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一场生死存亡的大革命。既然如此严肃，如此严重，如此残酷的斗争，没有团结，没有组织，没有战斗堡垒，是绝对不行的，乌合之众是不堪一击的，一盘散沙去讲阶级斗争，完全是儿戏。为了战斗，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决心把重庆愿意跟随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工人组织起来，把重庆工人造反军准备正式成立起来。

勤务组从9月25日就开会，第一、名正才能言顺，不少工人坚持：单称工人造反军不完善，造反是有阶级性的，我们是无产阶级造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造一切剥削压迫者的反，因此必须全称为“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国际关系学院孟宪成和他的同学们都说好，一致通过。第二、要有一个说服力强，贯穿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激情宣言，这个宣言要有（1）中苏论战“九评”的内容；（2）“十六条”的主要论点；（3）重庆工人的冲天呐喊；（4）要把造反军严明的纪律广而告之；（5）要表明：我们工人阶级坚决支持重大八一五学生的革命行动！这项工作由黄廉、唐工、陈未友、朱正坤、张怀珍去做，请国际关系学院孟宪成、吴有义帮助，务必在9月28日之前拿出来。

第三，造反军的成立大典时间定在9月30日下午，为了防止保守组织和走资派的破坏，具体时间绝对保密，不提前公布，对基层行业和战斗团、分部通知：“总部9月28日召开成立大会，28日下午各单位将出席大会代表领到六中，各单位准备的横幅、旗帜、传单，没有总部的指示不准拿出来，并请各分团、分部自己准备两三餐的干粮，何时进会场，会场在何地，临时听号令。这项工作由杨国成、杨木生、南岸城建分团的陈松柏、二轻徐传弟等同志负责。

9月29日下午，各单位造反军代表纷纷云集上清寺六中，教室、操场都坐满了，当时保

守的黑公安、市委的密探，也都到六中来探察，他们看人山人海，就是没有会场，没有主席台，这些老保认为成立大会开不成了也就走了。我们以私下串联的方式告知各分团并个别通知到个人，今晚不必回厂，各自就近投亲靠友住一宿，明天九点之前仍然在六中会齐，列队进入会场。当晚许多同志就借着六中的教室假眠一宿，工人当时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甘愿受累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我们设置这种虚虚实实的措施，把保守派捣乱意图全搞乱了。

9月30日下午二时，我们取得占领市人民大礼堂的重庆中学生九一纵队主要负责人刘先裕等同志的支持，同意我们借礼堂召开成立大会。这是云集在六中的造反军3000多名代表，列队、举旗，雄纠纠气昂昂地开进市大礼堂，里面不仅是座无虚席，而是连巷道都占满了造反军代表。工人造反军自己的纠察队立即封锁了各条通道，守住大门，与会者自己动手挂上横幅，贴上标语，宣言人手一份，会上笑声、歌声、掌声不断，由造反军总部杨国成主持大会，宣布大会开始，黄廉宣告“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经过血与火的大搏斗，今天正式宣告成立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一浪高过一浪。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国际关系学院的孟宪成等同志前来与我握手，表示祝贺，我看到他也是含着泪花。主席台就座的各位勤务员，杨国成、张原贵、朱正坤、陈未友、徐传弟等也都是激动不已，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各地来渝串联的同学代表，都前来表示祝贺。我们以无比自信和自豪的声音宣读了《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宣言》，每读完一段就是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是工人们看到自己的力量，尝试自己把我自己的命运的信念在起作用，这个场景我至今难忘。

在后来风激浪高的艰险战斗征途中，在走资派施展纵横捭阖的手段的离间和破坏下，工人造反军和勤务组也曾经有过沙浪沉浮，但总的看来还是稳定的，始终保持着工人阶级的坚贞、纯朴、诚实和革命坚定性。由于时间久远，自己年迈和记忆衰退，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许多人的名字都已经记不起来了，我希望那些还尚在人间同志，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把自己曾经光明磊落地参与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留给后人，以补充我的记忆缺失。

1966年9月30日晚，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成立大会结束之后，三千多名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又迎来了共和国17周年的曙光。我们和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一起，在解放碑市区中央游行，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向全市民众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游行队伍所到之处，群众无不报以热烈的掌声。

#### 四、在北京的经历

北京南下的学生一批批地来，又一批批地去。第一批红卫兵来重庆之后耀武扬威，行为非常过激，砸这砸那，陈伯达又把他们召回去了；第二批南下的学生比较讲政策，国际关系学院的孟宪成他们的宣传，就与第一批很不相同，他们很虚心、也很讲道理，主要是宣传毛主席的指示。他们说第一批大多数是干部子弟，有些人是西城纠察队的成员，不少人是“保爹保妈派”。

我心里也很苦闷，群众响应中央的号召，为什么总是受打击？为什么地方上毛主席的指示总是贯彻不下来？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体验到李井泉确实是个土皇帝，很霸道，在重庆鲁大东他们竟然组织起那么大的保守势力来对抗学生运动，这是怎么回事？这些重大问题，造反军总部想直接听听中央的声音，经商量，由我亲自去一趟北京，去的时候还有几个文艺界的人跟我一道，几个南下回京的学生护送着我去到北京，记得其中一个清华附中的一个女同学名叫林怀。

到北京之后，我就想着要找周总理和文革接待站。到接待站，我填表的时候老老实实把自己的履历和所写的大字报都写上了，是一个姓田的干部接待我的，他说“你是一个最正规的上访者”。他首先给我提了三个问题：你们说李井泉是土皇帝，他对毛主席的指示有那些很明显的

违背？李大章是老干部，解放后一直在四川工作，你对他是什么看法？重庆的情况我们基本了解，工纠是不是在积极抓生产？他们又是如何生产、如何革命的？我说工纠几十万人整天着装整齐游行示威，不准革命，他们既不革命也没有搞生产。我说我到北京来想要搞清楚，工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关心国家大事对不对？为什么总是挨批挨斗？受压的工人在重庆完全无路可走，这是为什么？我说自己对李井泉了解不多，省委的大字报揭露他生活腐化搞特权，重庆市委派工作组到重大，郑校长自杀，文革目标是要清党内的走资派，这些问题恐怕都是要搞清楚的。在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听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都有检讨，四川饿死那么多的人，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李井泉的检讨？

田干部回答我说，现在是要把北京打扫干净，这恐怕不是对待上访者的措施，下面各个地方都混乱起来了，不可小看，十月份可能会有些决策出来。然后他就按照对口接待的原则，安排我住在物资部接待站，地址是在天坛公园里面。第二天林怀等几个学生带我去见蒯大富，清华和中国人民大学一起在北京体育馆主持大会批判余秋里、林枫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会上揭发林枫派工作组到学校镇压学生，说他们对文革很不理解，批判很文明，林枫等坐在台上接受批判，学生们依次上台去发言。有人把蒯大富请下来做了介绍，他请我上台去坐，问了一些重庆的情况。当时我最关心的是工人起来关心国家大事，参加文革运动对不对？是不是反革命？蒯大富说最近毛主席就要在天安门接见革命群众，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从文革接待站回到天坛之后，周总理的联络员开了一台华沙车来找我，又与我摆谈了一阵，问了一些情况。最后要我暂时住下，说准备给我一张票，不过目前还没有定。后来又通知我到文化宫，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都是各地比较有影响的人，有湖南湘江风雷的叶卫东，西安的李世英，我和几个四川和广西来人住在一个帐篷里。晚上王力、关锋、戚本禹和林杰来看我们，王力讲了几句话，说毛主席发动文革，就是发动广大群众反修防修，要我们中国千秋万代高举红旗，有人说感谢王力同志代表毛主席来看我们，王力赶紧声明：“我没有资格代表毛主席，我们代表中央文革来看你们，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毛主席更想念你们，明天要在天安门接见你们。”戚本禹说：“你们被打成‘假左派、真右派’，遭到关押，你们受苦了，下面的干部对文革还很不理解，你们回去之后要帮助他们理解，也是帮中央文革的忙。”

他们还动员大家一定要遵守纪律，自觉将随身携带的铁器交出来，衣服要整齐，每个人填一张表，说我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那天晚上还带我们去看了我们站立的位置，是天安门下面的东观礼台，我们旁边的就是军事院校的人。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出发，等到十点钟，整个天安门广场人潮涌动，毛主席坐吉普车过来的时候，一个广西的年轻人在那里哭哇哭，最后昏过去了。游行队伍过来的时候，也是不断地有人昏倒，解放军抬着担架把他们送走。毛主席下车，走上天安门城楼，一边跟群众握手，想跟毛主席握手的人太多，到下午就传出消息说毛主席的手被争着跟他握手的的指甲划破，我们是在离毛主席很远的观礼台上，只看见他老人家，没有机会涌上去握手，时间大概是十一月份上旬或者中旬的样子。

这次赴京，我才大致弄懂了五十多天的问题是全国性的。对北京红卫兵中有三个司令部的情况也了解一些，我打电话给林怀，她说自己是“一司”的，现在她的爸妈不让出来了，红袖章也不带了，现在“垮司令”是相当风光，她把蒯大富称为垮司令。我到文化宫去，看到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的牌子已经被人砸了，我的好朋友孟宪成说自己是二司的，他不保守，对工人也很客观，他说：我们也造了一司的反，因为他们是保工作组的，搞打砸抢，到处东砸西砸，是受工作组的指派，西纠犯了错误，我们“二司”就不当保爹保妈派，要跟着毛主席继续干革命。到地质学院“三司”去一看，司令部里全部是首都各个大学派去的人，一看就知道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是真正的造反派，这一次我没有单独见到王大宾同志，是司令部负责人赵文明同志接待的。

文革接待站又来找我，对我说：“你来北京半个月了，也见了毛主席，应该早点回去。”我正要准备回重庆，第二天文革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又找到我，要我快去煤炭部第二招待所做造反军的工作，并说原来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可能再遭镇压和打击，要大家回去就地闹革命。他们用车子把我送到煤二所，我才知道造反军有250多人北上，起初他们是步行北上，走了一百多里，到了永川才上火车。我向北上告状的同志们转达了中央文革接待站的意思，他们说你的问题解决了，我们还没有解决呢，全市各单位的造反派被批斗、遭打击、扣工资、被关押、打成右派等等，你知道吗？国务院天天来联络员，还派记者来接待同志们，听大家的反映，同时也催我们早点回去。

在那里我又听到一曲重庆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的悲壮故事，参加北上告状的有各个行业的人。在我们造反军正式成立之后，旧市委的走资派害怕工人形成的组织，开始是千方百计地阻止工人造反军召开成立大会，我们也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在正式成立之后，不但举行了国庆游行，而且还在大街小巷里做了两天的宣传，市里当权派很恼火，下令各工矿企事业单位疯狂地打击参加了造反军的工人和干部，各个单位受到打击的同志深感事态严重，因此云集到六中和市总工会等地，举行游行抗议，印发传单、寻找当权派理论，还到市委去静坐都无济于事，许多工人回不了单位，生活无着，一项项反革命帽子压下来，怎么办？造反军总部的勤务员和首都串联红卫兵一起分析了形势，决定各个单位排除造反军代表组织北上告状，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汇报重庆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弄清楚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否有罪，工人该不该参加？

领导这次进京告状的总部勤务员有叶祖禄、朱正坤、杨国成、周世成、陈松柏、哈尔滨（赵勋忠）、张厚贵等，北京南下学生随同一路支持的有孟宪成、李扬快，北上告状团出发时有400余人，时间是1966年10月中旬的样子。他们临时时在菜园坝火车站受阻，大家无比气愤，决定步行上京，他们打着旗子，一路上散发传单，沿途演讲宣传，从重庆步行到永川。沿途一带，老百姓有议论，有掌声，有人送茶送水，还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来问长问短。市委当权派派大车小车尾追，来回队伍前后，步行的第一天只到达璧山县。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市委派出副秘书长许佳陆坐着小车追到璧山县，与造反军勤务员谈判，最后答应由市委派军用卡车将他们送去永川火车站登车，不存在什么“造反军在小南海强行拦火车，使铁路停运3小时”的事情，这是出于走资派的编造，在草稿上我也因袭了这个错误的说法。

造反军中间有人认为勤务组的人有右倾思想，说叶祖禄右倾思想严重，说不定是市委派来的；他们又在永川召开了“遵义会议”性质的会议，重新选举了勤务员，还承认我，其他几个选出来的负责人是杨国成，402工区的工人；张厚贵，重庆锅炉厂工人；朱正坤，四建公司的工人蒋兆林等。他们到北京之后，文革接待站的赵文成要他们找黄廉。

他们在京期间，天天到各个归口部去反映问题，揭露重庆的走资派抗拒文革的种种情形，控诉走资派怎么迫害批斗他们，还召开记者座谈会。还在北京人民公园召开一次四川赴京工人联合控诉李井泉的大会，北京各个部委和各大群众组织都派人参加了，各个报纸都派了记者，了解西南走资派对群众的镇压情况。各个部委的造反派，都支持四川赴京造反派，帮助解决吃穿，由于天气转冷，还支持了大衣什么的。

其间我去人民日报编辑部，见到了当时的总编唐平铸，他是一个军人。我要求他派人派记者去重庆，他送了一张毛主席的大像片给我们。他向我了解了一些四川和重庆的情况，唐总编说：我们看了你写的大字报，觉得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和认识高度，毛主席和中央文革都知道你们工人来北京和你们的大字报，建议你尽快把大家带回去就地闹革命，把重庆工人造反军带好，这是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希望，要拿出工人阶级的责任心。他还告诉我最近中央文革要召开一次会议，由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举办会议，准备请中央文革的人来作报告，专门讲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还有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全国各地都有代表参加，听了这个报告之后

希望你们重庆工人造反军带个头回去，你们200多人不能全部参加，问给你们20张票怎么样？我要了40张入场券，他开玩笑说没有座位不要造反啊。

会议地点是总后勤部在王府井的帅府园礼堂召开的，时间大概是十一月十五号或者十六号的样子。我拿着票回到煤二所，经过大家研究，基本上保证每个系统每个厂有人，进帅府园之后重庆工人造反军坐在第一二排。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出席大会，王力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报告，戚本禹讲粉碎走资派反扑的新胜利，关锋讲以革命促生产，以生产激励革命的辩证关系，讲了中央文革的意见。最后是说，情况已经清楚，线路已经明确，走资派各种伎俩都已经破产了，现在是我们努力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时候了，要大家回去就地闹革命，给毛主席争气。末了还问重庆工人造反军什么时候回去，有人回答说见了毛主席就回去，后面的人也跟着喊，一阵掌声过后，戚本禹说这也有可能嘛，不过要由毛主席来安排。

这一次我们是要参加毛主席倒数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了，给我们安排的地方是广场西侧、靠近人民大会堂的地方，工人造反军说不想站在那里看别人，我们要参加游行。因为不让外地人参加游行，我们就把队伍带到清华大学参加了他们，大家凑钱做了一个20多公尺的横幅和重庆工人造反军的旗帜，比哪个的横幅都大，十多个人拉着平面通过天安门，希望毛主席能够看得见。毛主席接见之后，大家受到极大的鼓舞，第二天我们就赶着回去。那个时候革命的政府，办事效率真是不一样，在大家的要求下，中央文革联络员同意给重庆工人造反军刻制了两枚白色塑料公章，还有一枚造反军驻京办事处的公章，此前造反军没有公章，只用了一个金石艺术家刻的“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艺术章代替公章使用。车厢已经帮我们包好了，票也已经买了，我们什么时候走，车厢就什么时候挂上去。我们心里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大家赶着买了主席像章，要买上一大包回去作为礼品，文件和传单也是几大包，吃的东西一点都没有准备。看到重庆工人这种精神面貌，煤二所的工作人员都很感动。

戚本禹说你们回去就是宣传队，我早就想好了要在成都下车，给李井泉示个威。我们到成都火车站下车之后，安排所有的造反军有秩序地坐在车站，我去给省委打电话要他们帮助我们找住的地方，接电话的是工交政治部主任张敏，他们怕我们分散下去了在成都造成影响，迅速就来了五台公交车，把我们拉到财贸干校住下。还来了两个干部，要求我们不要上街，还很关心我们好久离开，说我们有什么要求他们都一一记下来，这个时候省委正在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事情，我们就说要列席省委扩大会议，看他们到底是怎么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还要给成都的造反派战友汇报中央文革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讲话。没想到李大章竟然同意了，他说你们送上门来，我们欢迎，既然是中央的声音，工人有意见，我们应该直接听你们讲，听你们的观点。

（未完待续）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